

唐纳(马季良)1948年离开中国后,长年生活在国外,本文详细披露了唐纳国内和海外生活的历程。

唐纳:要热爱祖国(1)

◆ 陆其国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马季良系苏州人,生于1914年5月,原名马继宗、马骥良,曾用名马绍章,唐纳是他的笔名。他父亲马培甫曾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马季良后来英文文笔为人称道,很可能与通晓英文的父亲的影响有关。就像他的母亲费文英知书识礼,善刺绣,从小就给予马季良文化熏陶,使他从小喜读中国古典诗书一样。

马季良早年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从1930年起,他开始在家乡的《吴县日报》上发表散文和短诗。“九一八”事变后,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一些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家同盟”,他们创办流动图书馆,组织剧团赴苏州、南京等地演出进步话剧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其间他还与余增涛(史枚)、项志独(胡绳)、吴大珉、袁水拍等进步青年开始交往。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国事,讨论形势,探讨救亡之道。这样的经历对青年马季良日后选择人生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是余增涛,正是在后者的引领下,马季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从事革命活动肯定有危险。1932年春,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破坏,马季良为躲避当局追查逃到上海。在此时期,他开始频繁化名,并于这年夏天考入圣约翰大学。学校从此为他提供了一个得以让他充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他在这个大舞台上,一会儿是学生篮球队队长,一会儿是课余学生剧团骨干……青年马季良中文好,英文也佳。《晨报》“每日电影”主编姚苏凤很快就注意上了他,并从1933年起开始约他写影评,这可以说是马季良与电影结缘,也是“唐纳”这个笔名出现在报端之滥觞。除此之外,在《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中华日报》“银座”、《大晚报》“剪影”等副刊上署名“罗平”、“陈陀”的电影评论,也都是马季良以不同笔名所写。他的文章因不乏独到见解而广有影响,读者

也喜欢看他文章。

不说其他,但就影评的风格论,可谓要言不烦,直捣黄龙,一剑封喉,而且评论者的视野开阔,政治敏锐性很强。也难怪唐纳这个名字很快就被广大读者记住。尤其是1933年12月,《现代电影》第六期发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引发上海电影界一些人大肆鼓吹“软性影片”,攻击左翼电影运动。此时,夏衍等人领导左翼电影工作者奋起反击,而唐纳在《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太夫人》一文,成为这次反击中的“第一枪”。

《太夫人》原为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拍摄的一部在唐纳看来较“平庸的美国片”,影片“描写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怎样侥幸地爬上了伯爵夫人的地位”。唐纳的质疑是:“一个卖苹果的妇人会有着一个住在西班牙的从小不知道家庭状况的女儿?一批流氓帮这老妇人弄了大饭店的一间房间,一个绅士气的假丈夫,请了舞女,居然会瞒住了她的女儿和女婿?”在唐纳看来,影片“最巧不过的是,老妇人不得不要向她女婿吐露真相的时候,警长,官吏,市长也给她们的伟大精神感动了!”于是,唐纳由先前的质疑转而变成了尖锐的批评:“能在这里看到人间爱吗?除非软性电影论者才会看到。倒是这里强调着母爱,然这种母爱的强调,在现在是反进步的。”唐纳一眼看出,该影片的“主题是在向上爬哲学的表现,全副多偶然性成分”,是在“表现着小市民哲学的调和性与改良主义”。

此文写罢,唐纳觉得意犹未尽,又接连发表《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清算软性电影论》等。不久因迫于政府压力,“每日电影”发表反驳唐纳的文章,唐纳也不再为该专栏写影评,但他作为批判软性电影的主将及取得的成就,诚如有论者指出的:“使他在电影戏剧界乃至整个左翼文坛赢得了崇高的声望,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称道。”而能够印证此言不虚的,就是他的艺术才华被更多的人知晓和赏识,他也由此得以在1934年进入上海华艺电影公司担任编剧。这

个平台为他艺术才华的进一步施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这一时期他为抗日影片《逃亡》创作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歌词。接着唐纳又创作了《明星之歌》歌词。

这两首歌词前者经聂耳谱曲,后者由贺绿汀谱曲后,就像长了无形的翅膀,顿时飞传开来。即使几十年过去,今天吟诵这些激昂高亢的歌词,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激励和振奋人心的力量。相信它们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唱,一定会让人在这些歌词和音乐中,感受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正能量”!

除了写作,马季良的艺术才华还在表演上有了展露。1935年,他在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中,领衔主演知识分子李梦华,他将自己的银幕处女秀演绎得惟妙惟肖,广受好评,“唐纳”其人也因此为更多的人知晓。

开展进步文艺活动

马季良与蓝苹短暂结合,随后分道扬镳,即应友人推荐主编上海版《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周刊;同时还担任大公读者会总干事,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并邀陈波儿、袁牧之等名演员演出,为抗日救亡运动捐款。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更以《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身份,奔赴抗日前线和其他地方,采写了《嘉兴六日记》《乍浦到浦东》《雨夜闲话》等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内容,写得又好,在《大公报》甫一发表,读者便争相阅读。为了更有力地宣传抗日,鼓舞民众抗日士气,尔后又为《大公报》组织“大公剧团”,成员有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叶露茜、顾而已、金山等。上海沦陷后马季良随《大公报》到武汉,任外事记者,并兼中国电影制片厂宣传主任,同时主编《中国电影》月刊。即使这样繁忙,他也没有放下手中创作的笔,充满激情地创作了话剧《中国万岁》,并由“大公剧团”义演,主演舒绣文。此剧连演五场,场场爆满,轰动武汉三镇。嗣后又在重庆、南洋等地演出,抗日必胜的信念更深入人心。该剧后经重庆同行修改,由中

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誉满山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颁发一万元奖金作为奖励。演员剧团也易名为“中国万岁剧团”。

第二年冬天,马季良撤离武汉,绕道香港回到上海。不久担任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私人秘书和中文教员。此时他已开始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其间还一边坚持创作剧本,一边帮助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企重礼制了英籍发行人克明欲出卖报纸的企图。1939年后,数次离沪赴渝的马季良在中共地下党夏衍授意下,于重庆组织“中国业余剧社”,他与冯亦代分别担任正副社长。此后排演进步戏剧自不待言,直至1943年他应英国驻华大使馆之邀,在英国新闻处工作。借助这个平台,马季良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另外,这个平台也帮助他了解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所以他很想有机会去实地考察。就在他办妥护照考虑此行时,因抗战胜利,需要他回上海任《时事新报》主笔,去国一事因此搁置下来。当时《时事新报》的老板是孔祥熙,由于马季良坚持民主进步立场,为孔祥熙不容,血气方刚的马季良于第二年夏,毅然与报社一些进步同仁宣布集体辞职。

然而,《时事新报》再怎么给马季良带来不快,只是他绝不会想到,1946年他在该报任上参与的一次记者协会活动,竟让他有缘结识一位使他一见钟情的年轻女性。她就是陈润琼。在那天人头攒动的活动现场,马季良一眼就注意到了人群中一位身材高挑,身上有一股清新脱俗气质的漂亮姑娘。向旁人一打听,才知道她叫陈润琼,其父是外交家,她本人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法文报》和英文《自由论坛报》当记者,通晓英文法文。马季良后来承认,他对陈润琼可谓“一见倾心”。因为都懂英语以及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他俩很快就愉快地交谈起来。此后马季良也向陈润琼表白了爱慕之情。但不知是出于女性的矜持,还是觉得尚不够了解,总之,陈润琼当时没有接受马季良的求爱。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22. 访问部队

沪剧团编剧接到陈荣兰带回的稿子后兴奋不已,尤其是一直渴望创造抗日传奇剧的文牧,看了新奇而别具特色的36个伤病员湖上斗争故事,一下子唤起了当年他在上海近郊跑码头的抗战记忆,以剧作家特有的眼力和敏感迅速锁定了这个题材。他感慨万分地对陈荣兰说,这个素材新鲜、传奇、有特色,使他想起了抗战初期在沪郊生活经历中遇到的许多场景,想起了一些传说中的抗日英雄形象,完全可以写个引人入胜的东西!他打算改变原来的创作计划,毕其功于一役,全力创作阳澄湖伤病员坚持敌后斗争的戏。陈荣兰非常赞同文牧的想法。她在给崔左夫的信中写道:“沪剧团编剧文牧看完征文稿后说,根据《血染着的姓名》,可以编一个抗日传奇剧。”

几天后,陈荣兰带文牧去拜访自己崇拜而又敬重的老首长,当年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领导人,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的爱人朱一。刘飞是1957年南京军区公安部队整编时,由该部队司令员调任现职的。

陈荣兰和文牧的到访,唤起了朱一对苏南抗战峥嵘岁月的回忆,她为终于有机会圆刘飞在窑湾放飞的芦花梦而感到由衷高兴。

1958年11月,在朱一热情帮助下,陈荣兰、文牧和参与创作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的女剧作家宗华一起,到杭州市留下镇西穆坞村军营,访问了当年由阳澄湖伤病员发展壮大起来的第20军59师175团。部队特地把在湖州第20军军部写作解放军30周年征文的原第20军文工团演员朱仁抽回来,负责协调和安排两位艺术家的活动。当年在军文工团演《白毛女》时,陈荣兰饰演喜儿,朱仁饰演大春。久别重逢,陈荣兰和朱仁自然格外高兴。恰逢师文化科干事李吉祥在团里组织文艺会演,陈荣兰和宗华兴致勃勃地和官兵们一起观看了团战士业余文艺演出队演出的独幕小话剧《芦苇塘》。这台小戏,取材于



175团1营2连前身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芦苇荡坚持斗争的真实经历。看到上海人民沪剧团的领导和专家观看演出,团战士业余文艺演出队的小伙子们紧张得汗都出来了,有的登台表演时几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但陈荣兰很快就看懂了剧情,她扭头对文牧和宗华说,这不和我们要搞的东西一样嘛!原来这个团就是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芦苇荡坚持敌后斗争故事的发源地!陈荣兰决心把熟悉了解175团历史和熟悉官兵,作为创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课。她和文牧、宗华认真听取了团领导对部队成长壮大历程和建设情况的介绍,翻阅了175团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文章,到连队和训练场感受火热的军营生活,还召开了连队官兵参加的座谈会,在与官兵面对面交流碰撞中,熟悉了解官兵,重拾军营记忆,试图从新一代“江抗”人身上,去捕捉前辈筚路蓝缕创业的足迹。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陈荣兰、文牧和宗华的杭州军营之行,使他们找到了从今天回溯昨天的路径。三人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当年崔左夫笔下的那个雾霭笼罩、危机四伏的湖上芦苇荡,离自己近了,变得清晰了。

正逢部队纪念建团19周年,三人兴致勃勃参观了部队史馆,见到了36个伤病员名单和部分照片。当他们聆听官兵高唱团歌《你是游击兵团》时,两人被深深震撼了。

这首歌,是黄苇当年在52团2营当文化干事时,收集了36个伤病员“江阴老虎”、“反‘清乡’斗争和转战江北地区”等史料后,同老“江抗”成员、宣传股长过鉴青反复酝酿后一起创作的。谁知生孩子易,起名字难。两人先后琢磨过36个伤病员、江阴老虎团、工农兵团等歌名,最后由过鉴青根据陈毅关于6师18旅要成为游击兵团模样的指示,敲定为《你是游击兵团》。已是胸有成竹的过鉴青,两天就写出了初稿。黄苇则忙着去连队收集战士们曾经唱过哪些歌,喜欢什么曲调,为歌曲寻觅基本旋律和节奏。部队打哈拖后,《你是游击兵团》歌词经团政治处主任彭冲修改,并吸收老“江抗”指战员意见,初步定稿。团首长要求黄苇抓紧配好曲调。

34. 上海棉布冠盖全国

1875年,公共租界在九江路的第一个室内菜市场落成,这个菜场为钢结构,建筑以钢结构作支撑,屋顶则用大张的铁瓦,这个菜场也被当时的上海人叫做“铁房子”,这个菜场建成后,就有相当数量的菜农和小贩迁入“铁房子”经营。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有一个外国人利用今虹口区塘沽路、峨嵋路、汉阳路相交的三角地带开了一家叫做“飞龙岛”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后因经营失利准备停业。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工部局为方便摊贩和顾客集贸市场,在这里搭建木结构的大型室内菜场。因该菜场建筑平面呈三角形,故被叫做“三角地菜场”,民间老百姓索性简略地称之为“三角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角地菜场”被日军强占,并被叫做“麦盖岛”(即英文market的音译)。解放后,在菜场设摊的商贩按行业并为小组,1958年组成合作菜场,为上海规模最大的菜场之一。

在上海曾经名噪一时的室内小菜场,除虹口三角地菜场之外,还有福州路的水产公司,河南南路的铁马路菜场,陕西南路的西摩路菜场,舟山路提篮桥菜场,金陵中路的八仙桥菜场,北京东路的石路菜场等。

如今人们到上海郊区和周边古镇旅游,承包租用门面小贩向旅游者兜售的大抵是粽子、扎肉、蹄髈、拉丝、青豆一类,外地游客以为这就是当地土特产品了。其实如今江南古镇的景观,都是经历宋元明清几百年辉煌之后,留下来的一个空壳。那些所谓伴手土特产品,实在层次太低,了无新意。

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述风俗时,写下了颇为上海人引以自傲的一句话:“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缕、三绌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绌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这句话极其生动洗练地概括了明清时期上海棉布冠盖全国,即当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以及棉布贸易的繁荣景象。

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字滨江,号梅亭,生卒年不详,他把涉世六十余年亲身阅历的

世务记录下来,撰成《阅世编》一书,这部书堪称有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史料,叶梦珠对民情记录较为具体,议论也很精彩,其中田产、赋税、食货、徭役各门,对社会经济、人民负担及民生状况等述论详实。如卷二《田产》门及卷七《食货》门记土地及米、布、柴、盐、烟、茶、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顾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都有

醉上海

仲富兰



详备的记录,并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清代顺治、康熙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其中有一节专记上海县的棉布,“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官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南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一词始见于明代。他们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和丝绸布匹等手工业品为主;也有居间代揽水运雇船,称埠头,是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

那时的上海,种植棉花、盛产棉布,也兼营棉花交易的市镇几乎比比皆是。“金罗店、银南翔”,说的都是种植棉花、兼营棉布而富得冒油的比喻。月浦镇——四乡所产棉花,有紫花、白花两种,大宗外销商品,陈约《月溪棹歌》,“千家村里人喧闹,八月棉花满客航”,便是月浦镇棉花交易的一个写照。外冈镇地处冈身,盛产棉花,每当棉花上市,“牙佻持灯而往,悬于荒郊要路,乘晦交易”。而上海县城小东门外靠近黄浦江边一带,更是一个人声鼎沸的棉花交易中心。据上海县人、农学家和史地专家褚华的描述,“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棉花)者,肩相摩,袂相接焉”;闽粤商人“买花衣(按:本地人俗称皮棉为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可见小东门外的棉花市场交易量相当惊人。嘉定、道光间上海人杨光辅《淞南乐府》有两首直接写到各地商人在上海的棉花交易。